

罗蒂和 实用主义

——哲学家对批评家的回应

[美] 海尔曼·J.萨特康普 / 编

RORTY & PRAGMATISM



商務印書館

罗蒂和实用主义

——哲学家对批评家的回应

[美] 海尔曼·J. 萨特康普 编
张国清 译

商務印書館
200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蒂和实用主义：哲学家对批评家的回应/(美)萨特康普
编；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ISBN 7-100-03661-5

I. 罗... II. ①罗... ②张... III. 哲学—研究—西方国
家 IV.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182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LUÓDÌ HÉ SHÍYÓNG ZHŪYÍ

罗蒂和实用主义

〔美〕赫尔曼·J. 萨特康普 编
张国清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中 科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7-100-03661-5/B · 550

2003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

定价：19.00 元

目 录

| | | |
|-----------------------------|------------|---|
| 序言 | 赫尔曼·J.萨特康普 | 1 |
| 第1章 介于黑格尔和达尔文之间的杜威 … 理查德·罗蒂 | 12 | |
| 第2章 罗蒂的实用主义及告别信念和启蒙时代 | | |
| 查尔斯·哈茨霍恩 | 31 | |
| 对查尔斯·哈茨霍恩的回应 理查德·罗蒂 | 48 | |
| 第3章 美国与现代性之争：本特莱、杜威和罗蒂 | | |
| 泰尔玛·Z.莱文 | 58 | |
| 对泰尔玛·Z.莱文的回应 理查德·罗蒂 | 73 | |
| 第4章 美国实用主义：诸叙事的冲突 | | |
| 理查德·J.伯恩斯坦 | 78 | |
| 对理查德·伯恩斯坦的回应 理查德·罗蒂 | 96 | |
| 第5章 什么是工具主义的遗产？罗蒂对杜威的诠释 | | |
| 詹姆斯·卡因洛克 | 101 | |
| 对詹姆斯·卡因洛克的回应 理查德·罗蒂 | 125 | |
| 第6章 实用主义作为自然化的黑格尔主义：战胜先验哲学？ | | |
| 艾伦·汉斯 | 136 | |
| 罗蒂对艾伦·汉斯的回应 理查德·罗蒂 | 163 | |
| 第7章 粗俗的实用主义：一种无益教化的见解 | | |
| 苏姗·哈克 | 169 | |
| 对苏姗·哈克的回应 理查德·罗蒂 | 200 | |

| | | |
|---------------------|------------|-----|
| 第 8 章 罗蒂和反实在论 | 弗兰克·B. 法莱尔 | 208 |
| 对弗兰克·法莱尔的回应 | 理查德·罗蒂 | 253 |
| 第 9 章 哲学和未来 | 理查德·罗蒂 | 262 |
| 注释 | | 273 |
| 理查德·罗蒂论著目录 | | 309 |
| 索引 | | 326 |
| 译后记 | | 347 |

序　　言

赫尔曼・J. 萨特康普

凡德贝尔美国哲学文库

《罗蒂和实用主义》是“凡德贝尔美国哲学文库”的第一批书籍中的一本。这套丛书探讨了美国思想的发端、范围、根基和边界，它通过强调当前哲学研究的某些论题以增进人们对于以往哲学探索的了解。关注美国哲学是一种实用主义策略，它为激发起远远超出北美哲学的思考提供了一条基本思想线索。毕竟，哲学既不是一门地区性学科，也不是一门民族性学科。凡德贝尔美国哲学文库通过加强我们对以往知识的了解，通过为未来的人们提供一批研究，以达到推进哲学的目的。

罗蒂和实用主义

理查德・罗蒂对传统哲学研究形式的挑战既赢得了许多赞誉，也遭致了诸多批评。罗蒂主张，哲学无法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作为永恒真理之追求的传统哲学观在一个世俗化了的世界里必须给予抛弃。¹关于哲学处于诸学科层系之巅的断言是一个错误。相反，我们应该从实用的、解释性的和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哲学。那个角度摧毁了精神哲学和知识论诸多基本基础性问题的中心地位。²清晰性和精确性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不过清晰性仅仅

是熟悉性，而不是某些语句的固有属性。

罗蒂的反本质主义哲学继承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治疗”传统。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虚假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或者更恰当地说，得到了清除。³但是在本书中，罗蒂在对是否要把这些问题作为无意义的东西来处理上表现得更加犹豫不决，他更加敏锐地注意到了本质主义传统的效用性。

我有时使用了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一些贬意词，诸如“nonsense”、“meaningless”^①等等。但是我现在后悔曾经那样做过。我认为，当他说只要你愿意你可以给任何一个事物以意义的时候，维特根斯坦是更富于智慧的。像占星学家和神学家曾经赋予他们的问题以意义那样，知识论者以同样的方式赋予了各种问题以意义：即通过把它们置于某个融贯的语言游戏之中。但是，所有这三种语言游戏的效用问题仍然存在着。（原著第 223 页，注释 1）

罗蒂对于哲学事业的剖析已经遭致了许多批评，其中有的措辞激烈，有的敏锐而深刻。在本书中，罗蒂对他的 7 位最引人注目和深思熟虑的批评家作出了回应。他们分别是哈茨霍恩、莱文、伯恩斯坦、卡因洛克、汉斯、哈克和法莱尔。虽然这些批评家代表着很不相同的哲学背景，呈现了各不相同的关注热点，但是每个人都提出了关于罗蒂哲学观的重大意义问题。无论人们是否赞成罗蒂的回应，它们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深刻地揭示了罗蒂的思想、他

^① “nonsense”和“meaningless”都是指“无意义的”意思。——译注

的思想的发展以及他对哲学未来的见解。它们推进了关于哲学角色和哲学社会贡献的讨论。

罗蒂和杜威

通过考察哲学的历史和未来,罗蒂从两个相反的维度上接近哲学。¹罗蒂与杜威具有最为清晰的历史联系。他把杜威看作是导师和领袖,而不是最后的仲裁者。

罗蒂对杜威实用主义的训诂使哲学和美国思想重新回复到了为当代讨论的热点问题而提出实质性见解的一系列原创性洞见上来。但是他的训诂又超出了确当性。杜威的声音受到了罗蒂的哲学角色观的过滤,而且,在注意到他与杜威之间的师徒关系之后,罗蒂迅速地指出了自己的不同之处。他抛弃了杜威的经验和科学方法观念,认为这两个观念都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如果人们认真地对待它们的话,只会导致严重的混乱。他的批评家认为,罗蒂把小孩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而且他们往往反对罗蒂对杜威的分析,也反对他关于实用主义对当前讨论之意义的见解。

在本书中,罗蒂主张实用主义是“避免科学与宗教意识或道德意识之冲突”的一种历史方法,它用“‘效用性’取代了作为某个知识承诺之术语的‘精确性’或‘具体性’”(第4页)。他担心的是哲学进步反而阻碍了研究。他把这种担心看作是为哲学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哲学的特殊职责在于弄清旧哲学观念并没有为研究设置路障……对于在较早时期运用于社会和道德努力中的规范语言的延续使用并没有使它更难以去处理当代的各种问题”(第14 xi页)。

在杜威那里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旧哲学观念,另一些旧哲学观

念仍然影响着当代哲学方法论，在那里，杜威实用主义的精髓（而不是字面意义）可以作为一种正确的东西被保存下来。罗蒂赞成赫拉雷·普特南的主张：许多分析哲学已经堕落为诸哲学教授团体不同“直觉”之间的纷争，其通常讨论的问题“既没有实践意义，也没有精神意义”（第 202 页）。而且他坚信，杜威的姿态使实用主义更有益于哲学研究。

杜威本来可以满足于这样一个事实：20 世纪已经没有闲暇时间来谈论终极实在的本质。部分地，这是因为，作为一个话题，语言之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伴随着某个日益增长的认可：出于不同的愿望某人可以用不同方式描述同一事物，已经促使实用主义作为一种规范判断的相对性学说，更加令人称心如意地保存诸愿望。更重要的或许是，20 世纪的诸多发展——弗洛伊德对内心道德冲突的考虑、不同社会生活形式的人种学描述、在文学和艺术中的实验派——已经使我们更容易用杜威的问题，诸如“我们应该享有哪些团体的愿望？我们将乐于成为哪一类人？”去取代康德的问题，诸如“我该做些什么？我能希望什么？人是什么？”（第 15 页）

罗蒂和哲学的未来

在本书的结论性论文“哲学和未来”中，罗蒂对哲学之不久将来所抱的乐观态度将使一些人感到惊讶，而另一些人将对他关于“维护民主对哲学家角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断言提出质疑。但是这两个前景在罗蒂的世俗化了的智性世界之网中是一些必不可少

的主线。

对罗蒂来说,只要存在着社会文化变迁,哲学的未来就是安全的:“哲学不可能终结,除非社会文化变迁终结了……在自由社会里,将始终存在着对于他们[哲学家们]的服务的需求,由于这些社会从来没有停止过变化,因此,从来也不会停止去淘汰过时的语汇。”对世俗化了的思想界构成新挑战的是自由和时间。由于不再有真理的仆人而只有“民主政府的公务员”,哲学家们将把自由赞美为“真诚地与他人相处并不因此而受到惩罚的东西”。在放弃了对于确定性和永恒前景的希望之后,哲学家们还应该放弃这样一种确信:他们的直观比随机的历史结果更丰富。“真理,像自由一样,是暂时的、随机的和脆弱的。但是我们可以识别这两者,因为我们拥有着它们”。哲学家应该把他们的角色看成是历史化了的:

假如我们不再把自己放置于诸学科层系之巅的那个位置,假如我们不再以“理性的思维”或“清晰的思维”来识别我们的职业实践,那么我们将处于一个较好的位置上去接受杜威的见解:我们的学科并不比工程学或法理学更有能力去处理自己的事务。这种承认将帮助我们去反驳这样一种观点:科学或政治的发展必需“某些哲学的基础”——这种观点断定,除非我们哲学家确切地声明它们是合理的,否则的话,判断力必须对文化新事物的合法性保持怀疑。(第 201 页)

一如杜威指出的那样,这种哲学的使命在于,“哲学所能提出的仅仅是假设,而且,这些假设的价值仅仅在于,它们激发起人的心灵更加敏锐地对待他们的生活”。⁵这个新的哲学目标是创造生

活的敏感性,而不是获得新的知识成果。

罗蒂对其批评者的回应

通常是通过分析和回答某些具体的争论和批评,理查德·罗蒂小心翼翼地回应了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尽管有人会对其回应的精确性和适当性提出异议,但是他显然认真地对待了批评者的各种评价,而且他的答辩不只是一些机敏的辩驳而已。他的回答不仅揭示了他在哲学论辩中的诸多见解和倾向,而且展示了他的个人趣味和生平细节。下面的评述和引文仅仅展示了罗蒂回应所涉及的范围和关节点的某些轮廓。

第一个批评由查尔斯·哈茨霍恩来做是恰当的。哈茨霍恩是 XIII 罗蒂的第一位哲学老师。罗蒂的回应是迷人的,这是一位颇受敬重的学生对其颇受敬重的导师的回应所具有的那种迷人:“查尔斯·哈茨霍恩是激发我真正地着迷于哲学的第一位老师。我迷迷糊糊地主修了哲学,但不清楚等待着我的将会是什么。要是当初没有去上哈茨霍恩开的课的话,我或许又会迷迷糊糊地逛出哲学的大门”(第 29 页)。他跟随哈茨霍恩的研究启发了他对随机性和时间的早期思考。“我还受到了哈茨霍恩引用的出自柏格森的一番话语的影响,‘如果时间不是实在的,那么没有东西是实在的’。当我撰写关于历史性和随机性的另一篇颂词的时候,那一番话语仍然久久地回荡在我的心中”(第 29 页)。他甚至提到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

我撰写的第一篇哲学论文试图把维特根斯坦和皮尔士联合起来,把他们两人都看作是柏拉图主义、必然性、永恒性和

卡尔纳普的世俗主义批评家。(当然,那是《进化之爱》的皮尔士而不是《相对性之逻辑》的皮尔士,他是我最为仰慕的人物。)经历了 30 余年的摸索之后,我现在仍然持着相同的世俗化观点,仍然对理解哈茨霍恩(和在这一方面的卡尔纳普)持着同以前完全一样的反应。(第 30—31 页)

罗蒂既对哈茨霍恩作出了明确的批评,也对哈茨霍恩给予了得体的赞美:

我已经毫不客气地指出了我是多么尖锐地不赞同哈茨霍恩的核心哲学主张。我希望通过同样坦率地表示我对作为一位老师和作为一个人的哈茨霍恩的敬仰来保持这种批评的平衡。一位在 19 岁就试图去决定与其人生休戚相关的事情的人肯定会受到他碰巧遇到的某些角色模式的影响。在师从哈茨霍恩学习期间,我被这样一种想法所感动:如果这种人就是哲学教授,那么成为一名哲学教授也许并不是一个坏主意。虽然无论是对知识的热衷还是对精神的宽容,我都自以为没有达到他为我树立的榜样,但是我仍然为自己曾经是哈茨霍恩的学生而感到无限自豪。(第 36 页)

前学生与其教授之间的这种对话为何以达到学术关系的极致提供了一个榜样,而且,罗蒂对自由和时间所产生的敏感性关注同来自哈茨霍恩的许多教导的确是分不开的,正如他说他赞成伯恩斯坦文章中说的“几乎每一件事情”时那样。

罗蒂与其批评家的遭遇产生了另一些亲切的时刻。在谈到汉 XIV

斯时,罗蒂写道:“我感谢汉斯如此广泛地阅读了我的作品,感谢他对我的近代哲学史观作出的非常贴切的考虑。在撰写那个哲学史时,我从来没有因我对黑格尔所作的评述而感到欣喜过。黑格尔的许多东西对我来说仍然是神秘的。尤其是,我无法饶有兴趣地、愉快地、以理解者姿态那样地去阅读《逻辑学》或把《逻辑学》读完”(第 122 页)。罗蒂对法莱尔的《主体性、实在论和后现代主义——世界的复元》作了这样的评述:“我希望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此类著作,它从容不迫地徜徉于黑格尔和戴维森之间,徜徉于丹尼特和德里达之间,与此同时,它保持了某种前后一致的观点,发展了一条强有力始终如一的论证路线。我尤其敬佩法莱尔对布鲁门柏格关于培根、笛卡尔和近代世界的奥卡姆起源(Ockhamite origins)的说明所作的富有见地的和创造性的利用”(第 189 页)。但是罗蒂对他的一些批评家所作的善意赞许并没有掩盖他们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的那些领域。莱文和卡因洛克就罗蒂对杜威的解释和对实用主义的忠诚提出了质疑。他们的见解激起了罗蒂的如下反应:“一位伟大哲学家的每一个弟子都有义务为其导师区分开其教义的精髓和字面意义。这种义务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伟大哲学家说的每一件事情并没有令每个人都心悦诚服。结果总是这样,他或她并不是最后的哲学家,即道出了每一事物的真谛,把诸事物阐释得如此精妙绝伦以至于更深入的哲学不再成为必需的那个哲学家”(第 52 页)。而且,“在我看来,杜威从莱文和卡因洛克那里受到的处理所带来的麻烦是,这些注释如此拘泥于其字面意义以至于它们对现在的读者毫无益处”(第 53 页)。

哈克把罗蒂看作“也许是在当代讲英语的哲学里对知识论事业产生最重大影响的批评家”(第 126 页),他把罗蒂同斯递恰相提

并论。因为两人“都诋毁证明标准应该以它们的示真性来判定的观点。罗蒂认为这种观点是没有意义的；斯递恰则认为这是一种心胸狭隘的门户之见”。哈克称他俩为“粗俗的实用主义者”。（通过加入莱文和卡因洛克的行列）哈克对他们的主张同古典实用主义世系的关系提出了挑战。在其论文中，她明确地论证了那个挑战。罗蒂对此作出回应的一个样本是：“当哈克说我准备转变成为一名知识社会学家的时候，她讲得是有些道理的”（第 139 页），“……但是我更乐意说是‘知识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道德家’，在那里，‘道德家’意指‘对以特定方式改变其切题的辨别能力的利 XV 弊具有看法的人’。在这一意义上，‘知识道德家’也就是有时被称作‘文化批评家’的那些人”（第 225 页）。

在谈到他与哈克的更根本分歧时，罗蒂写道：

哈克和我之间的一个分歧是，她认为知识论是一个关于反映的自然而明显的话题，而我认为它在今天之所以还存在是因为有些哲学教授仍然认为认真地采取知识怀疑论的立场是重要的，而我发现这是一种毫无益处的精神训练。一旦你放弃了这种怀疑（例如，以米歇尔·威廉斯在其《非自然的怀疑》中放弃巴里·斯特劳特的方式），那么我想你就不会有意去杜撰知识论的怀疑论了（除非你从一再地抗拒原教旨主义者、忠信主义者和还原主义者中得到某种乐趣，如我看到哈克成功地做到的那样）。我认为詹姆斯和杜威（甚至皮尔士——在其反笛卡尔“诸能力”的论文中——虽然在其许多段落中充满着夸夸其谈的东西，如哈克在第 147 页摘引的那些段落）说服我们不再严肃地对待怀疑论者。他们为此而做了一项非常

杰出的工作。通过要求我们更多地关心切题的事物，较少地关心僵硬的事物，（或者像莱文和卡因洛克那样，更多地关心结果而不是方法，）他们完成了那项工作。（第 225—226 页）

法莱尔写道，促使他写作那本书的动机是这样一个信念：罗蒂“对最近的哲学作出了不可信的考虑，他误会了一些人物，尤其是误会了戴维森”（参阅“罗蒂和反实在论”）。⁶为此，罗蒂就其对戴维森理解的可靠性作出了解答。罗蒂写道，“他[法莱尔]为之辩护的实在论者的直观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实践功用，他对它们的坚持似乎只具有一种纯粹精神上的功用。假如我俩都摆脱掉了‘宗教的’自高自大心态的话，那么我们或许会同意，没有一个人的语言曾经是或将会是无拘无束于世界的，而且没有一个人将会对‘这些限制是什么’、‘它们是如何运作的’之类问题提供有意思的明确见解”（第 194 页）。在其答辩的几个地方，罗蒂提到了自己的思想的发展，正如他在回答法莱尔时说的那样：

XVI 我认为法莱尔对那篇论文[“失落的世界”]以及我的许多其他论文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它断定某种激进的主观主义是惟一的出路，在其中自我一方面依照某个无特征的现实设计出各种花样（普特南讥之为“切甜点者之见”），另一方面自我面对着无法知晓的本体……但是“失落的世界”是在 23 年之前写成的。我后来一直致力于阐述一种不再摇摆于主体和客体、心灵和世界之间的立场，但是那种立场又被试图取消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的努力所取代。可以说，我一直试图把我们和世界都予以抛弃。而法莱尔把我理解成以牺牲世界为代

价，千方百计地把我们发扬光大的那种人，并希望以一种“温和实在论”来协调两者的平衡，而我想要终止使用“我们一世界”(us-world)的对照，并因此放弃“实在论—反实在论”话题。（第 191 页）

上述典型实例透露了本书中诸论文和诸答辩辞的某种趣味，但是它远远没有揭示出其中蕴含的思想的丰富细节、强度和深度。我把那些欣喜留给读者自己去发现。我们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即，能在一本著作中，伴随着某位重要哲学家本人的直接答辩，去检验他的几名最优秀的批评家。《罗蒂和实用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用罗蒂的话来说，它扩大了和丰富了我们自己的那一套哲学语汇：

我把人类历史过程看作是一首冗长、膨胀、声音日益嘈杂的诗，一首逐渐使自己不可救药的诗。届时人类终将明白，“人性的整个启示”将不是一系列命题，而是一系列语汇。鉴于我仍然找不到理由去赞成詹姆士和哈茨霍恩的如下主张：“最好的事物是更为永恒的事物”，我怀疑没人能得到这一启示。不过我确实不知道，永恒性事物或无限空间的缄默不语，何以如此地令人神往。（第 33—34 页）

第 1 章

介于黑格尔和达尔文之间的杜威

理查德·罗蒂

¹ 詹姆斯·克洛奔伯格把杜威看作是一位“走中间道路的”哲学家，一位在唯心论和经验论之间走中间道路的哲学家。其著作《不确定的胜利》第 2 章的标题是“激进的知识理论”。按照克洛奔伯格的说法，这种理论的核心坚持某种新的非原子论经验观念，该观念同狄尔泰的经验观念和詹姆士的“纯粹经验世界”观念只具有最少的共性。在克洛奔伯格看来，这个新的经验观念从实用主义出发把真理看作是推论。¹

像克洛奔伯格一样，大卫·荷林杰尔强调在威廉·詹姆士身上的实用主义和激进经验论之间的联系。² 克洛奔伯格和荷林杰尔都把詹姆士和狄尔泰关于内在生活和经验之流的谈论——那种谈论是柏格森和怀特海关于误置的具体性(*misplaced concreteness*)的谈论的延续——看作是荷林杰尔所谓的“在一个科学时代里为文化寻求基础的一组主张和希望”的重要组成部分。³ 他们两人把荷林杰尔称之为詹姆士“向唯心主义泛灵论转变”的事件看作是德国唯心主义对美国实用主义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克洛奔伯格正确地指出，杜威关于经验“承载着内在于它自身的联系和组织的原理”的主张是格林和黑格尔的一个“回音”。